

岳麓的雨

□石一宁

又到长沙，又来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

进得头门，院内草木送香，旧地重游，内心涌起一阵亲切感。迎面大门上方是宋真宗赵恒“岳麓书院”匾。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召见岳麓书院院长周式，欲拜周式为国子监主簿。国子监为国家最高学府，书院是民间学校，皇上亲自下聘，但周式还是婉拒了，宋真宗乃赐“岳麓书院”匾，笔酣墨饱，圆满端庄，显然对岳麓书院及其院长周式是心存敬意的。

在那皇权至大的时代，宋真宗的召见和御题对岳麓书院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所起的作用，应是无人怀疑的吧。检视后人对于宋真宗的评价，基本上也还是正面的，虽然对景德元年（1004年）他与辽国签订的以岁币求和平的澶渊之盟不无争议，之后又做出伪造天书的荒唐事，但他开创了“咸平之治”，政绩不凡。在文学和书法方面，他亦达到颇高的造诣，流传千古的名句“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即出自其诗作《励学篇》。如此一位推崇读书的皇帝给岳麓书院题写院名，可谓适得其人。

天不作美，开始落下零星雨点。我兀自站在院内砖地上，心中再三吟读大门两旁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这是有典故的。故事说，清嘉庆年间岳麓书院大修，院长袁名曜为大门撰写对联，出“惟楚有材”句让门生们应对，贡生张中阶对曰：“于斯为盛。”此流水对意思倒是甚为明白：楚国人才众多，岳麓书院尤最。然而，两联出处却有讲究，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此对联虽易解，却来历深深，甚有气势。

大门两侧，分置一对双面浮雕汉白玉抱鼓石，为宋明时期珍品，传说是清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澍作为钦差大臣查抄江南大户曹百万财产时发现，转赠岳麓书院。陶澍出身于岳麓书院，此举应是他对母校的情感使然。这对抱鼓石，也确实古代艺术品珍藏的意义上增加了岳麓书院的分量。

雨点渐大，游人有些骚动，跟随导游走进二门。二门上悬隶书“名山坛席”匾，系集清代何绍基字。

何绍基，湘人，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四川学政，晚年先后主讲南溪书院、长沙城南书院、苏州扬州书院等，书法、诗词皆名重晚清。

门匾上的“名山”，指岳麓山，因岳麓山乃五岳中的衡山之尾。“坛席”一词，表达尊师之意。两旁对联为：“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两联分别出自《尚书·舜典》：“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和《史记·太史公自序》：“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此外，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又云：“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通邑大都。”《尚书·舜典》之“纳于大麓”讲述的是舜经受了尧对他的考验，司马迁之“藏之名山”交待的是《史记》成书后藏书之处。岳麓书院二门张挂此副对联，是对书院师徒的一种期许，亦是一种文化自豪感的宣示吧。

二门背面，悬“潇湘槐市”匾。原匾清代即有，为清代学监程颂万撰书，已毁于抗日战争期间。现匾为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原主席楚图南所书。

槐市，汉代长安读书人聚集贸易之地，因有“槐树数百行”（《三辅黄图》）而得名，后指学宫。称“潇湘槐市”，岳麓书院当之无愧。而补书者楚图南亦不只是职衔崇隆。

出生于云文山县城的楚图



岳麓书院

南，同时还是作家、翻译家、书法家和学者，著有小说集和散文集。翻译方面，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出版美国惠特曼诗集《草叶集选》、德国威斯特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尼采《查拉斯图如是说》、俄国涅克拉索夫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等译著。

进入讲堂之际，雨终于放纵地下了，声大如潮。讲堂的陈设布置，让人一下子置身于密集的历史遗迹与信息之中，而讲堂外的雨声，恰似历史的回声。

岳麓书院讲堂自北宋创立以来历代反复毁建，现在见到的，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重建，同治七年（1868年）大修而成。

檐下是“实事求是”匾，初为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撰写。湖南工专1917年迁入岳麓书院办学，程书匾于抗战期间被日机炸毁，1985年集东汉摩崖石刻《石门颂》字重制成匾。《石门颂》被誉为隶中之草，对后世书法影响甚大。“实事求是”典出《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相对于书法，“实事求是”的哲学思维更是意义重大，它后来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

讲堂正中，悬挂“学达性天”匾。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分别给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

书院及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张载、邵雍、朱熹等理学家祠堂赐“学达性天”匾。赐岳麓书院之原匾已失，1984年集康熙字重制。学达性天是对宋明儒学的中国哲学传统和教育精神的一种概括，也是对追求天人合一的一种期许，亦是一种文化自豪感的宣示吧。

长方形的讲台上方，悬挂着另一块鎏金匾“道南正脉”，系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所赐。

理学自洛阳二程南传，在朱熹而为闽学，在张栻而为湖湘学。张栻南宋时为岳麓书院主教并代行山长职事，朱熹二度游学岳麓书院，“朱（熹）张（栻）会讲”当年轰动儒林，听者达千人。“道南正脉”四字是朝廷对岳麓书院的高度评价。

伴随着哗哗雨声，我细读讲

台后木质屏风中刻写的张栻撰《岳麓书院记》。

文中指出，修复岳麓书院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们“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也不是“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而是为了“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而已故湖南大学校友、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周昭怡女士端严圆润之小楷补书则有相得益彰之效。

浏览讲堂南北两壁所嵌之“忠、孝、廉、节”“整、齐、严、肃”大字碑，让人思接千载，视通古今。“忠、孝、廉、节”为朱熹手迹，“整、齐、严、肃”四字则为清乾隆时期岳麓书院院长欧阳正焕所书。

讲堂的多副对联，亦令人目不暇接，再三回味。其中长联“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涉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系清代山长旷敏本撰，原联已于抗战期间被日机炸毁，补书者为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颜家龙。此联表达了对儒学之崇信坚持，别具一种感人的力量。

讲堂墙壁尚嵌多块清代碑、石、木刻，兼具史料和文物价值。其中《岳麓书院学规》碑，对今人亦尤多启示，如“时常省

问父母”“气习各矫偏处”“痛戒奸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有过笔”“夜读仍戒晏起”等。此碑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刻，岳麓书院院长王文清撰文。这些条文既是岳麓书院学规，亦反映着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与方法。

大雨滂沱，阻碍着游人继续前行的脚步。人们拥挤于讲堂内，看而又看，思而又思。讲堂内外，每一牌匾、对联、碑石、木刻，都是有来历、大讲究的。来岳麓书院，可谓一次国学之旅。如此一想，心中便对身边周围的游人生出许多好感来。不论他们的国学根基如何，在这个以金钱衡量效益的资本和信息时代，肯来这散

发着古人幽思的岳麓书院一拜或一游，实在难得。

导游是一位眉眼清秀的潇湘人样貌女子。她说，岳麓书院现在是湖南大学的一个学院，书院的导游很多都是毕业于湖南大学。说话间神情颇为自豪。

长沙多暴雨，在岳麓书院遇到的这场雨，算是让人领教了。观览完书院讲堂，雨不仅没收歇，反倒越下越大，如注如泼。无法继续前往更多景点，只好进入书院的书店翻翻书，内心却惦记此次未能重游的胜迹。首先想到的是爱晚亭。

出岳麓书院后门不远，便是与安徽滁县醉翁亭、杭州西湖湖心亭、北京陶然亭公园陶然亭并称中国四大名亭的爱晚亭。爱晚亭由岳麓书院院长罗典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原名红叶亭。“爱晚亭”之名为湖广总督毕沅根据杜牧诗句更改。

但有一传说则与此相左。故事说清代文学家袁枚年轻时到长沙，登山拜访罗典。但罗典认为袁枚为人放荡，作文亦另类，且收女学生，故心生厌恶，托病不见。袁枚吃了闭门羹走后，罗典竟叫人水洗书院门前台阶，以驱除邪气。袁枚离开长沙前，写诗吟赞岳麓山景物，唯《红叶亭》一首只抄录杜牧的绝句《山行》，且故意漏抄两个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枫林，霜叶红于二月花。”罗典听闻，愕然之后连道“惭愧”，即令门生摘下“红叶亭”匾额，改亭名为“爱晚亭”并亲题新匾，此后对晚辈多予爱护。

相对于毕沅改亭名的正史，我更喜欢这则传说，因为它刻画了罗典古板而又知错即改的可爱性格。或许，这也是岳麓书院传统和精神的某种隐喻？

这一掌故如同一条隐隐约约的线，让人联想线上的一些点。岳麓山腰、白鹤泉后，由花岗石圆形基座和矩形尖碑组成的蔡锷墓及墓主生平，更浮现脑海……

蔡锷1882年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市洞口县）。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蔡锷在云南领导新军起而响应，任云南军政府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此举兼笼络与看管之意，然起初蔡锷对袁仍抱好感，认为袁“宏才伟略，群望所归”。

1915年5月，袁与日本秘密签订《二十一条》，并酝酿称帝。作为早年即矢志推翻帝制、“流血救民”的革命军人，蔡锷心中愤怒之火被点燃。同年11月，蔡锷以治病为由离京赴日，12月19日辗转抵达昆明。12月12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承认帝制，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承认帝制，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承认帝制，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承认帝制，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承认帝制，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承认帝制，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承认帝制，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承认帝制，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承认帝制，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承认帝制，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承认帝制，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承认帝制，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袁世凯在北京宣布承认帝制，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鲍人

枇杷晚翠

枇杷晚翠，这是《千字文》中的句子，描述的是秋冬时节枇杷树叶依然翠绿的自然景象。

《千字文》写于1500年前南朝的梁武帝时期，由文学大家周兴嗣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不重复的1000个字编成文。将1000个不重复的字写成文理通顺、对仗工整的韵文，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更何况这篇文章还蕴含着中国人文历史发展的哲理。此文一出，其所集书法即成为时人及后人习练王羲之书法的范本，其文辞则成为幼童启蒙的教材。许多书法名家还把精心写就一幅千字文作为自己书法艺术流传后世的重要载体，传至今日的作品版本不下十数种。

枇杷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多产于南方，直到今天都不是一种大众化的水果。在古代，它如荔枝一样为北方人所少见。因此，在惜字如金的《千字文》中写进枇杷，让人有些意外，或可理解为枇杷有幸吧。

虽然从小就常见枇杷树，但是我对于枇杷晚翠的景象并无特别的记忆。印象中的枇杷树总是那个样子，春夏秋冬不分季节的深绿。印象深刻的还是它黄澄澄的果实，三五个、七八个甚至十数个一串，当然也有零散的，带着绿叶，满满地装在竹筐里。竹筐有水缸大小，为市井中常见，多用以盛装米面果蔬及各种生活杂物。这印象再延伸开来，便是长长的巷子，被岁月染灰的白墙，绵绵细雨，斗笠蓑衣以及叫卖声。

这种印象产生于20多年前的一个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之前，枇杷虽常见却不常吃，因为家里没有买水果的生活概念和经济能力，而学做顽童小贼与同学翻墙攀树偷摘的几个青黄不定的枇杷也如那时的年华一般青涩，不值得追忆。在这个阶段之后，枇杷的美味已经难敌北方水果甚至是进口水果的诱惑，而诱惑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心理上的优越感和追求时尚的心态。只有在那个特定阶段，天空最纯净，心灵最朴实，囊中自然也最羞涩。那时的印象，如同一幅画，或者几幅景象相近的画。

看不清窗外是否还下着细雨，只是檐上滴水仍“哗啦啦”不停地打着地面和楼角的芭蕉叶。偶尔有一两声自行车铃声，还有时远时近的布谷鸟啼。

悠然间，响起一声闽语：“枇杷喽——”再响起时，声已渐远。

“枇杷！枇杷！”她说。

跑下楼来，雨丝如发。站在大门外，侧望小巷深处，还看得见担子。

“枇杷！”我大声喊。挑担人停下来回身张望，又摘下斗笠用力甩着雨水。

“多少钱呢？好像不够黄呀！能便宜一点吗？”

然后交钱，捧着枇杷和满心的欢喜回去。我们俩看看对方，发丝凝雨，雨水流下面颊，却也比挑担人身上蓑衣滴下的雨滴温暖。

其实若问那时的枇杷味有多美，实在是无从回味了。枇杷好吃，对我而言却难臻至甘至美的境界，只是看到她喜欢，就觉得它应当是甘美的。

离开家乡这些年，每到这个季节，若有南来的亲友询问需要带些什么，我总会告诉他们带些枇杷。虽然此物在如今的北方也不罕见，但总有一个情结，相信从南方带来的就是比在北方市场上买的好吃。这个习惯也为许多亲友所熟知，因此有时他们索性就不问了，直接带来就是。而我们见到这南来的枇杷，仍然是满心的欢喜。

再过二十多年，见到枇杷我们还会这样欢喜吗？如果是，那可真是枇杷晚翠了。



乡愁

□赵仁方（纽约）

乡愁
从路告别的那一秒
就时时萦绕心头
旅途越走越远
思念越来越浓

乡愁
一丝牵挂 天涯无不同
近在咫尺莫言愁
游子水中望月
何时踏上归程

乡愁
从旅途开始的那一刻
就伴我四海云游
平日深藏心底
袖口酒杯更愁

乡愁
甲午桂月 悲风愁云起
丁酉正月 晚萤莹莹
泪眼不识萱草
路边不见亲娘

乡愁
旅途漫漫 惟山长水远
人生道路多坎坷
思乡之情再愁
难敌无亲之忧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